

纪念、展示与消费： 鲁迅及其文学的博物馆化研究

Commemoration, Exhibi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Musealization of Lu Xun and His Literature

赵慧君

Zhao Huijun

(青岛市博物馆, 青岛, 266100)

(Qingdao Museum, Qingdao, 266100)

内容提要：在跨学科的影响下，博物馆、纪念馆和主题公园等展示空间被纳入现当代文学的范畴。以博物馆、纪念馆和主题公园中的鲁迅为研究对象，既可以讨论展示空间中的鲁迅是如何继承传统的文学色彩和革命精神，也可以考察其是如何随着文化消费与文化旅游的日渐兴盛而被商业化的。这种独特的空间策略和视觉叙事与文本中的鲁迅形成了某种呼应，并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多重观念之间的复杂性。

关键词：鲁迅 博物馆 主题公园 现当代文学 商业化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disciplinarity, exhibition spaces such as museums, memorials and theme park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is paper takes Lu Xun in museums, memorials and theme park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discusses how Lu Xun in exhibition spaces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colors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how has been commercialized with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cultural tourism. This unique spatial strategy and visual narrative not only echoes the Lu Xun in the text, but also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and hybridity of multiple ideolo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Lu Xun; museum; theme park;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ommercialization

鲁迅是20世纪中国出现的空前绝后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是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1]。一个世纪以来，鲁迅及其所构造的世界衍生出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甚至“鲁迅学”成为一门显

学。具体而言，对鲁迅的研究与论述涉及文化学、哲学、人格学、伦理学、思维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创作学、编辑学、批评学、美学、艺术学、语言学、翻译学、学术史、文化史、历史学、

教育学等诸多领域^[2]，但关注展示鲁迅、纪念鲁迅的博物馆学研究相对较少^①。作为“民族之魂”，鲁迅的纪念与阐释方式多种多样，既有严格的学术研究、丰富的展演活动，又不乏网络的营销推广、影视的制作拍摄。此外，遍及中国几大城市的鲁迅纪念馆和主题公园构成了纪念鲁迅的整体空间，这些文化机构与政治景观不仅延续了民族国家关于鲁迅的传统叙事，而且涉及身份重构与商业化等后现代议题。

从研究视野来看，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的文本解读，或者说“纯文学”研究逐渐陷入困境，跨学科研究或综合研究日益成为一种趋势。华盛顿大学的伯佑铭（Yomi Braester）认为，流行音乐、影视等都已纳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3]；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邓腾克（Kirk Denton）则认为，流行文化可涉及电视、摇滚、杂志、广告、网站等领域^[4]。基于此，博物馆、纪念馆与主题公园等视觉修辞和展示空间也属于广义的、跨学科的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作为一种可以被阅读、被分析的文本对象，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展示空间不仅是一个记忆之场，而且是一个建构知识、传递信息的文化机制。由此，对展示空间中的鲁迅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呼应文本空间中的鲁迅，形成一种对鲁迅的互文性理解；另一方面也能够借此窥探博物馆叙事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意义。总体而言，鲁迅的空间分析与解读可从传统问题来关照当下，既能够填补鲁迅研究的某些缺失，还可折射出当代中国表述革命与历史的张力与困境。

目前，博物馆学界对鲁迅展示的研究更多强调展览历时性背后的政治性和对革命的表征^[5]。本文在呈现展示鲁迅的传统方式及其背后的政治性的同时，意欲揭示当代中国展示鲁迅的新尝试，即将鲁迅主题公园化，以此来强调展示的商业化和经济

化，进而窥探当代中国不同观念与潮流之间复杂交织。为此，笔者并不着笔于有关鲁迅其人及其作品、思想等的探究，而着力于将空间展示中的鲁迅作为研究对象，以纪念馆和主题公园中的鲁迅形象为经验材料，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是如何在记忆之场中展示、展演鲁迅遗产的。

一、纪念鲁迅

庄钟庆曾提及“研究鲁迅是为了更好地纪念鲁迅、传播鲁迅”^[6]。那么，研究什么、纪念什么、传播什么？其背后的观念与机制是什么？在文学史的帮助下，不同历史时期的各自内在结构已经得到描述，并形成一个有机的演变序列。但多重意义与历史集聚的纪念鲁迅的空间景观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在笔者看来，作为观念、知识的物化空间，纪念馆和主题公园的分析对于理解鲁迅的当代价值极为重要。

作为民族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公共性、政治性和民族性角色。在现代文学、思想史和哲学等研究领域，以鲁迅及其所构造的世界为主题的学术成就毋庸置疑。在博物馆分类中，纪念鲁迅的展示空间首先属于人物类纪念馆的范畴。人物类纪念馆是我国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因鲁迅而开设的纪念馆数量、地位显著。纪念空间从两个方面彰显了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地位与价值：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中，鲁迅位于“20世纪大师风采”展厅的中心位置，其他六位大师——茅盾、郭沫若、老舍、冰心、曹禺、巴金以此为中心分居四周。在展示技术上，通过场景再造的方法展示鲁迅伏案工作的沉思状态，传递出一种忧国忧民、鼓舞公众的基调。另一方面，与上述主角展示相互映衬的是鲁迅纪念馆

① 目前有关鲁迅的博物馆学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钱旭初《多义性文化空间——鲁迅纪念馆(博物馆)谈》（《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9期）、《作为城市符号与文化资源的绍兴鲁迅纪念馆》（《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刘欣《展览中的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历史、政治与展示体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文本、语境与表征体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展示文本分析》（《北京文博》2017年第4期）。

的数量优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北京、绍兴就曾竞相争夺鲁迅纪念的优先性和合法性。鲁迅先后在绍兴(1881.9—1898.5、1910.7—1912.2)、南京(1898.5—1902.3、1912.2—1912.5)、杭州(1909.8—1910.7)、北京(1912.5—1926.8)、厦门(1926.9—1927.1)、广州(1927.1—1927.9)、上海(1927.10—1936.10)7个城市居住、生活,1950年以后,这7个城市纷纷设立鲁迅纪念馆。邓腾克曾提到,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个现代文学家能够像鲁迅这样获得如此大规模的官方纪念^[71]^[81]。鲁迅在现代文学馆中的地位 and 数量众多的纪念馆设置,充分彰显了纪念鲁迅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性。

由于鲁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生活面貌,这些不同地区的纪念馆的展示内容各有侧重、形象略有不同。得益于丰富的馆藏和建在首都的地理位置等有利条件,北京鲁迅博物馆力求完整叙述鲁迅生平;其他各馆生平陈列多采用叙述加专题方式^[81],如绍兴鲁迅纪念馆依托于故乡之情侧重于鲁迅青少年生活,南京鲁迅纪念馆侧重于其南京求学经历,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侧重于其在厦门时的历史文物资料,广州鲁迅纪念馆侧重于其主要革命实践与革命精神,上海鲁迅纪念馆则侧重于其精神生活与成就。虽然在展示内容和组织风格上有所不同,但是上述纪念馆在谈及鲁迅生平阶段和知识演进时,叙事模式基本保持一致。鲁迅纪念馆中的叙事共识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即鲁迅的自传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的表述^[71]^[82]。此外,国家资助带来的权威话语和稳定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纪念景观的连续性和共识性。

从博物馆研究视角来说,文学和文学人物的纪念与展示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现象,早在古代中国就有传统文学家的纪念之地。不过,传统文学家的内涵具有单义性,儒家经典气息和文人精神典范往往是纪念与展示的核心主题。现代文学和文学人物的纪念与展示则相对复杂,不仅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过程,而且存在阐释与解读的意义多样性。从时间维度来说,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博物馆研究领域,有关鲁迅的建构伴随

着政治场域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鲁迅形象的阐释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转变:先后经历了“启蒙鲁迅”“政治鲁迅”“文化鲁迅”“文化产业鲁迅”几个阶段的发展^[9]。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便于研究的抽象概念并非是一种后者替代前者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意义叠加的层累过程。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纪念馆和主题公园中的鲁迅形象是一个窥探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关键所在。

二、展示鲁迅

当代中国的鲁迅纪念馆是一个交织着多重意义与历史的场所,其对鲁迅的纪念与展示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笔者以北京鲁迅博物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基本陈列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鲁迅是如何被展示的,以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理念究竟如何。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前后一共经历了六次较大的变化:分别是1956年、1974年、1981年、1996年、2006年和2021年。这种历时性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替代,而是暗含着当下与历史的继承、修正与协商。从叙事结构来看,北京鲁迅博物馆基于编年体的时间序列展示自1956年以来延续至今,鲁迅的生平线和政治隐性线在展示空间中彼此表述,相互映衬。从叙事线索来看,1981年根据地点转变和事件发生来划分展示单元的策略依然存在,绍兴、南京、日本、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成为分割展示的重要依据。对鲁迅的认识经历了由基本知识普及到圣化鲁迅再到回到真实的鲁迅的过程^[81]^[84],其中,“从鲁迅出发,回到鲁迅中”的个性化原则是1996年生平陈列的灵魂^[10],标志着鲁迅由此开始走下神坛。这种真实的、生活化的鲁迅形象一直延续至今。从革命导师到文学大家,从被表述的阶级斗争战士到自我表述的民族之魂,从被铭记的公众人物到被遗忘的婚姻家庭,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展出的鲁迅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象征符号,其内在结构融合了不同时期的文学理念、革命思想和意识形态。

如果说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有关鲁迅的展示集中体现了当下与历史之间复杂的继承、修正与协商关系,那么,绍兴鲁迅纪念馆则集中诠释了作为文化资本的鲁迅与绍兴城市发展之间的纠葛。邓腾克认为,绍兴的城市形象与鲁迅其他地方名流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71]85}。钱旭初的研究指出,作为鲁迅的故乡,绍兴与鲁迅形成了一组“城与人”的关系,成为绍兴重要的文化资源^[11]。这样的一种鲁迅地方化的建构是如何在绍兴纪念馆中实现的呢?在绍兴纪念馆的第一部分,鲁迅与其他与绍兴有关的历史人物并置于展示空间中,比如大禹、勾践、陆游、徐渭、秋瑾,建立了一个基于“城与人”的无时间谱系。在这里,鲁迅成为值得纪念的帝王、文化英雄、作家和革命家序列中的重要环节^{[71]86},不仅提升了绍兴的城市品牌,而且赋予了鲁迅多重的身份认同。

可以说,每个地方的鲁迅纪念馆在展示鲁迅上都有其独特之处:上海鲁迅纪念馆对“立人”“兴国”等主题的提炼与展示;南京鲁迅纪念馆展出“中学课本中的鲁迅”;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设立“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示;广州鲁迅纪念馆展示鲁迅“玩在广州”的别样人生。可以说,鲁迅作为“民族之魂”的文化地位是众多展示策略的前提和基础。

最后,讨论鲁迅展示的身份议题,即展示何种身份的鲁迅。鲁迅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诸多头衔于一身,不同身份背后的所指有所不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简单来说,五四运动孕育了两种思想传统:强调个人解放的启蒙精神和强调批判社会的革命传统。从文艺理论视角来看,前者属于批判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后者属于革命现实主义,带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和政治使命^{[12]97}。简而言之,前者大体指的是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后者大体指的是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从根本上来说,上述两种基本原则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鲁迅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形象批判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其立意是自主、人类行为终极目的和普遍性^[13]。鲁迅的革命家形象是民族的觉醒和

建设,其立意是政治性、阶级性和服务性^{[12]92-93}。在展示鲁迅的纪念馆空间中,作为手段的启蒙精神被成功纳入作为目的的革命传统中,也就是“立人”与“国民性”服务于“救国”与“社会主义理想”。无论是绍兴鲁迅纪念馆还是上海鲁迅纪念馆,都能够清晰地看到有关鲁迅身份展示的矛盾和张力,这种复杂性不仅源自于鲁迅自身形象,而且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以及处理五四运动遗产的态度密切相关。

展示鲁迅是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纪念馆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不仅与鲁迅及其所构造的世界、鲁迅学术研究有关,而且受到时空维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当代中国商业化和市场经济等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便构成了鲁迅在展示空间中的另一个形象——消费鲁迅。

三、消费鲁迅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话语和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彼此博弈的时代,“告别革命”^[14]理念让记忆之场的传统形态陷入表征革命与过去的危机中。在这一点上,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启发颇为重要。在谈及当代的全球现代性危机时,德里克提出了传统阐释的多元现代性或替代性现代性术语^[15]。具体到中国,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话语在最近几十年遭遇到了文化消费主义、全球旅游发展、新型的记忆与纪念形态,以及应对过去断裂的怀旧主义^[16],其结果是多元话语或替代性叙事与官方权威声音的并置。需要指出的是,替代性叙事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并非意味着颠覆或挑战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对传统模式的完善和补充。

就革命历史和红色遗产来说,1995年,民政部确定了第一批(100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新型的爱国主义模式,红色旅游是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完善与补充,不仅延续了国家巩固意识形态的初衷,而且通过传承革命历史寻求大众娱

乐和经济消费^[17]。大众化和商业化的趋势普遍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景观中，纪念馆和主题公园等展示场所也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新型的怀旧情绪和商业化发展是依托传统纪念馆，通过故居修缮、主题公园、想象的再造等方式实现的。消费鲁迅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绍兴，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鲁迅故居工程，整合城市资源，以鲁迅的名义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以小说为蓝本，建构一个回到过去、表征过去的主题公园——鲁镇。这两种围绕鲁迅形象的尝试进一步丰富了鲁迅之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反映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现状。

2002年，绍兴市委、市政府在鲁迅纪念馆原有基础上，实施《鲁迅故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打造了“鲁迅故居”历史街区。“鲁迅故居”历史街区包括鲁迅当年生活过的故居、祖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还恢复了周家新台门、寿家台门、土谷祠、鲁迅笔下风情园等一批与鲁迅有关的古宅古迹。与传统的鲁迅纪念馆展示不同，“鲁迅故居”将鲁迅遗产挪用为一种城市认同和文化资本，将其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予以经营。据一些游客反映，来“鲁迅故居”是为了找寻小时候在课本上阅读鲁迅小说时的想象。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雕塑、建筑、复原场景，以及鲁迅作品的摘录文字和照片。码头、小船、拍照、餐饮、特产等景象，以及小说中提到的茴香豆、绍兴黄酒、龙须糖等小摊随处可见。可以说，江南印象、独特民俗、地方特产、文化旅游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鲁迅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文化的商业化和大众化成为消费鲁迅的地方策略。

消费鲁迅的另一个更为激进的例子是位于柯岩景区的鲁镇。如果说“鲁迅故居”是在与鲁迅有关的历史遗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话，那么原先在绍兴历史上查无此地的鲁镇则是按照鲁迅作品，如《祝福》《孔乙己》《明天》中对鲁镇的描绘，以及当时绍兴水乡的民俗风情、建筑风貌、自然风光等要素还原出来的主题公园。上述两种形态构成了科林·索伦森（Colin Sorensen）所说的主题公园的

全部所指^[18]。鲁镇于2003年9月建成开放，占地150亩，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分为传统餐饮区、传统商铺区、休闲展示区、传统民居区、水上游览区五大区域。商铺区里毡帽店、豆腐店、越瓷店、古玩店、锡铂店、贡品店、茶漆店、油烛店、当铺和钱庄林立；民居区里豪华气派的鲁府、外土内洋的钱府、鲁家祠堂、奎文阁、阿Q栖身的土谷祠和旧木板房的民宅错落有致；阿Q、祥林嫂、假洋鬼子、鲁四老爷等鲁迅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出现在街上，一幕幕展演着鲁迅小说中描绘的场景。借用鲁迅的“故乡”记忆，结合绍兴传统风情，鲁镇打造了一个主题公园式空间。观众进入其中观光与游玩，从而实现了从文化层面上的对作为文化资源的鲁迅的消费。

通过物件与气氛的营造而再现过去感，进而满足游客休闲娱乐需求的主题公园模式成为当代中国展示文化中的普遍策略。需要注意的是，鲁迅的故乡情怀与当前重回乡土的怀旧之情是否一致。我们知道，离家是鲁迅、郁达夫等早期知识分子不断书写的意象，离开故乡和排斥故乡反映的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本身的暧昧关系^[4]。可以说，鲁镇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与市场化潮流背景下的“怀旧疗法”，然而，这种尝试不仅引发了有关鲁迅故乡情怀的质疑，而且再次落入到商业化的圈套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消费”不限于经济化和商业化的维度，还包括文化的消费，即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发生文化层面上的侵染和消费。从博物馆到主题公园，展示鲁迅空间的变化意味着让更多的人去认识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主题公园式的空间消费鲁迅不仅是对传统意义上文化价值的延续和拓展，而且是商业化和经济化视角重新让鲁迅“活”起来的当代尝试。

四、结语

纪念鲁迅是由官方机构创建、维护、支配的统一行为，因此，各个鲁迅纪念馆的秩序与叙事能够在国家资助和官方机构^[19]的支持下保持共识与稳定。虽然上海鲁迅纪念馆与其他鲁迅纪念馆在展

示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专题性和表现性的手法也仅仅止于技术层面，尚未对鲁迅的官方叙事形成颠覆。中国的纪念馆等文化机构在重塑历史、反映变迁方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新形态的展示空间——主题公园已经开始出现。“鲁迅故居”和鲁镇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在展示鲁迅上的传统取向，其大众化和消费化的诉求导致了消费鲁迅现象的出现。

由此看来，纪念馆和主题公园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当代中国完整的展览体系。现代文学馆与各

个鲁迅纪念馆属于传统的文化展示形态，无论在物件选择、展示叙事、评论文字还是展示技术方面，其展示空间无一例外都会根据国家权威话语表述鲁迅的文学成就、革命精神和民族情感。而“鲁迅故居”和鲁镇则属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产物，是一种属于主题公园范畴的创意性、现代性旅游场所。在这个以文化复制、文化移植和园林环境等手段为载体的公园里，鲁迅及其想象的怀旧之感成为地方社会消费性和商业化的工具。

参考文献

- [1] 唐弢. 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 鲁迅(原版序)[M]//汪晖. 反抗绝望: 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6-14.
- [2] 姜振昌, 吕周聚. 走向整合转型的鲁迅研究——评冯光廉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鲁迅》[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4): 271-274.
- [3] 刘江凯. 通与隔: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问题[J]. 文艺争鸣, 2013(6): 45-50.
- [4] 王桂妹, 罗靓. 北美汉学家Kirk Denton(邓腾克)访谈录[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1(6): 5-10.
- [5] 刘欣. 展览中的鲁迅: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历史、政治与展览体系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4.
- [6] 庄钟庆, 葛涛, 苏永延. 研究鲁迅是为了更好地纪念鲁迅、传播鲁迅: 庄钟庆教授谈厦门大学研究鲁迅在厦门的过去与现状[J]. 上海鲁迅研究, 2016(2): 212-223.
- [7] DENTON K. 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 [8] 黄乔生, 姜异新. 生命的路: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策展笔记[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3.
- [9] 李磊磊. 阶级、爱国主义、文化: 一项关于鲁迅的社会记忆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1946-2013)[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6.
- [10] 李文儒. 《鲁迅生平》陈列艺术之研究[J]. 中国博物馆, 1997(2): 25-31.
- [11] 钱旭初. 作为城市符号与文化资源的绍兴鲁迅纪念馆[J]. 鲁迅研究月刊, 2014(7): 55-59.
- [12] 朱沙. 苏联美术与新中国油画[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 [13] 茨维坦·托多罗夫. 启蒙的精神[M]. 马利红,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4.
- [14] 李泽厚, 刘再复. 告别革命: 回望二十世纪中国[M].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7.
- [15] 阿里夫·德里克.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M]. 李冠南, 董一格,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5-39.
- [16] DENTON K A. Museums, “memorial sites and exhibitionary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5, 183: 565-566.
- [17] RIOUX Y L. Marketing the revolution: tourism, landscape and ideology in China [D]. Fort Collin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7: 33.
- [18] SORENSEN C. Theme parks and time machines[C]//VORGIO P.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89: 62-64.
- [19] FLATH J A. Managing historical capital in Shandong: museum, monument and memory in provincial China[J]. The Public Historian, 2002, 24(2): 54.